



波伦亚思古记

王铭铭

从意大利回来不过两天，来自意大利南方的师弟 Alexandro 就来北京作客。闲聊间问我最近去了什么地方，我说刚去意大利北部开了一次学术会议。师弟起先面露光彩，略表兴奋之意，几秒钟过后，却立刻失望地对我说，“你去错了地方，你应当先去意大利南部，由我作陪！”他接着说，“意大利北方人跟西欧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冷酷而不热情，理性而不好客，令他这个来自南方的人感到为人有问题。”言下之意，真正代表意大利人性格的，是他自己家乡的那些热情好客的南方人。

没有到过他的家乡，我当然也没有办法来对“地区性格”的问题妄加评论，而由于我在意大利北部也只呆了一个星期，未能结交很多朋友，因此只能同意说那里的人们确实有点“冷面”（即英语所谓的“long face”）。然而，在内心深处，我对整个意大利的印象十分之好，以为在这个半岛上居住的人们——至少从他们造就的那些我在短短几天之内可以看见并借以想象的文化造物而言，比起那些表面上礼貌、实际上理性的英国人和总好讲“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美国人来说，确实有着更多的情趣。

这次参加的学术活动，是今年度（2000年）11月6日至7日在波伦亚举行的“互惠知识研讨会”。波伦亚这座古老而美丽城市位于波河谷（the Po Valley）南部，热诺河和萨维纳河之间，亚平宁山脉北面。从文化上来看，它的辉煌时代是中世纪，但此前经历了伊特如思坎（Etruscan）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这是一座有着高度艺术、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城



市，全城以红砖造就，街道两边全都配建走廊，市中心四处屹立着中世纪和哥特式的建筑（教堂、市民大厦等）。我们的会议地点设在波伦亚大学著名学者埃柯（Umberto Eco）创办的研究所，而主办人也是埃柯本人。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一般的意大利人来说，埃柯的名字与他那部被拍成电影的小说《玫瑰之名》关系最为密切，而《玫瑰之名》被认为是伏尔泰式的哲学故事，更与我这里要表达的体会有着密切关系。

《玫瑰之名》故事的场景设置在1327年一座意大利弗郎西斯科教堂中，这座教堂十分富有，但却有人指责它的教士对于教义有不恭之罪。于是，神甫威廉被派来监察。在威廉刚刚到来之时，教堂在七天七夜之间陷入了死亡的恐惧：一具教士的尸体铺陈于猪血之中，另一具漂浮于澡堂的水面，还有一具在屋檐边上曝露着……威廉教士从教士一下子变成侦探，他综合了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阿奎纳斯的神学、罗杰·培根的实证观察方法，将这些洞见磨练为敏锐的目光，他收集证据、解剖教堂中的神秘象征和文本，深入教堂内部黑夜之中发生的最为令人发指的事件。

埃柯的小说中，破案不是主要的，它的全部内容几乎完全献给了威



艾科主持马里人类学家木萨索的讲座



波伦亚的教堂

廉教士侦探过程中遭遇到的教堂内部的事情。跟随着威廉教士侦探的步伐,读者被引入到一座十四世纪意大利教堂当中,体会它隐藏在日日夜夜之中的迷信与偏见、激情与冷酷,以及中世纪建筑的光辉和暗淡。

我私下猜测,埃柯教授这位露着典型的意大利智者神情的学者,想在《玫瑰之名》中以奇特的侦探小说形式,表达自由与智慧的期盼。我忘记问他本人这个故事的场景是否就是波伦亚,但值得庆幸的是,得到一个准确的答复,或许比我们自己去想象一种联系无聊得多。

会议期间和会议之后,我在波伦亚走访了一些地方。在市中心,盯着一座歪歪斜斜的砖塔,走进几乎完全用红砖造起来的那好些教堂,在教堂的里头阅读天堂和地狱的壁画,《玫瑰之名》的故事活生生地呈现在眼前。教堂的忏悔室接待着后悔犯了“罪”的人的忏悔;两边的画廊偶然能够集中一些追悼死者的亲友、传播出教士低沉的诵经声;天主、处女母亲玛丽亚和基督的身影,伴随着天使和黑暗的使者,鼓励那些善者,惩罚那些恶者;教堂空间肃穆的氛围,到处能够使人感受到秩序的威严,理性的胜利,以及对于不信教者的侵略性——所有这些东西,不正是《玫瑰之名》想要诠释的符号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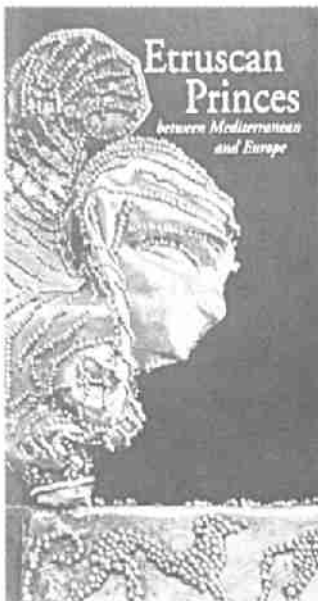
然而,教堂的内部虽则如此,它们的外观却清一色是属于罗马、哥



特式的建筑。如此古老的建筑风格,给予波伦亚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美名,而这个美名给我们一种特殊的想象——似乎这座城市的存在必须首先是它的罗马、中世纪的文化延续,似乎生活在这座“老不死”的城市当中的人们,就没有一点现代人的人情味、自由味和浪漫味。旅游者的好古之心,诚然可以得到谅解。可是,我们却也很难忘记,这样的建筑曾经给予我们中国“从东方走向西方”的先辈们的那些光辉想象——教堂建筑的如此“宏大叙事”,向来被我们想象为中国文化缺乏的东西,而同时也向来矛盾地被我们认定为西方文明终将衰落的表征。

康有为 1904 年游历意大利,没有到过波伦亚,但他到过罗马。他的《意大利游记》之“奥古士多宫”一节,叙述 288 年罗马皇帝地克里生裂国为四,导致罗马灭亡,使欧洲各国分裂争战无己的历史,他评论说“欧人经千年战争之世,苦亦甚矣”。比较中国历史,他说:“中国号有文明,皆进于汉唐宋一统久安之世。”而若中国被分为“十八国”,则“其为罗马、印度哉!”他欣赏罗马言“今欧人之文明皆本于罗马……不忘其祖,宣盛称之。”对于罗马帝国时期的辉煌及西方后代对于它的遗产的继承,康有为表露出无尽的欣赏;而他对于罗马帝国之后欧洲政体和宗教的分离及君主国家的分裂主义,抱持深刻的惋惜之情,让我们想象得出,这位近代中国的智者对于罗马式、哥特式文明的怀旧。

康有为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可是,他或许疏忽了一个史实,即,西方文明及其在十五世纪以后的世界霸主地位的生成,远非是在罗马时代实现的。即使是对于罗马帝国,我们中国的老祖宗们也把它看成是与阿拉伯世界“大食国”类同、与“诸番”相近的“大秦国”,是依照中国朝贡的经济—文化复合体系来界定的“国”之一,而这远非今日之“国家”,很多对中华帝国朝贡的“国”,仅仅是当时的一些部落民族。倘若西方文明未能在十五世纪以后逐步以地中海文化圈为中心波及整个世界、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那么,我们对于罗马帝国及其文化的想象,就不会那么的美好了。同时,无论如何,我们看西方的时候,不能只看这个文明的类型与我们自己的大一统的世界一致的地方,不能以我们的“秦”去衡量“他们的大秦”,我们还应当看到,对于“大秦”文化遗产的想象,已经包含了一层《玫瑰之名》对于它的内涵及后世可能对它提出的挑战的可能途径,已经包含了埃柯在他的小说中呈现出来的另一种怀古的心态——一种对于比“大秦”以前和以后的亚里斯多德们、阿奎纳斯们、培根



“伊特如思坎王子”主题
展览的招贴

们的怀念。

在波伦亚，城市的古老面貌弥漫着罗马、哥特时代的沉重感，但在老至九百年的大学众多研究教学部门、在那些陈列着独特内容的博物馆当中，我们却能够体会到另外一种气氛。埃柯的研究所，设在一座古代宫殿建筑之内，其庄严肃穆之感不言而喻。然而，在这样的庄严肃穆氛围内展开的学习、讨论、研究、对话等等，没有一项停留于康有为想象的“大秦帝国”辉煌之中。一位研究生捧着一本后现代的社会理论书籍在拼命地“啃”着，另一位恭敬地阅读着新近的美术研究著作，而这个研究所更提倡电子教学和传统教学方式的结合，出版一份电子杂志，甚至主持着一个“网络大学”的项目。这诸多的新潮，其实不能说是与古史完全断裂开来的“后学时尚”。倘若

我们去访问这里的博物馆，那么，这些“后学时尚”能够在历史的遗迹中得到充分的印证。

访问波伦亚的短短几天，我主要参观了当地的博物馆。首先，当然是去了波伦亚市民博物馆。这座外观其貌不扬的博物馆于1881年成立，建筑的前身为15世纪创立的死亡医院（Ospedal della Morte），它却集中了波伦亚大学及其他地方的藏品及后来在本地发掘的文物。博物馆的陈列分波伦亚及其内地的史前时代、伊特如思坎维拉诺凡时期（公元前九世纪至七世纪）、塞多萨时期（公元前六世纪）等及希腊、罗马时期。而这座博物馆最有名的，显然是伊特如思坎各时期的展品，这些展品表现了“伊特如思坎文明”（Etruscan）的历史发展及特征。尽管人们通常把罗马、哥特时代当作意大利的辉煌时期，但在博物馆的展示中“伊特如思坎文明”却独占鳌头。道理十分简单，“伊特如思坎文明”才是当地人们认同的“意大利土著文化之根”，而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文化之根”，其实并非是“西方的”，而与西方特定年代的“东方化”



(Orientalizing) 有着至为深刻的关系。

“伊特如思坎”指的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古代民族，它的种族来源据希罗多德说，并非是“白种的西方人”，而很可能是来自“东方”（中东和地中海南部）的“东方人”，来自于“小亚细亚”。这个民族在罗马帝国建立以前，一直支配着整个意大利的文化和政治，后来与希腊文化一道造就了罗马文化。“伊特如思坎文明”的“维拉诺凡时期”是这一文明的最早期，它的名字来自于波伦亚地区伊特如思坎文明的最早发现地维拉诺凡（1853 年发现）。这个时期初期的考古学文化特征较为单一，到公元前八世纪出现了多元化的表现，说明社会阶层的划分当时已



“伊特如思坎文化”的青铜鼎

逐渐明确。而到公元前七世纪时，随着伊特如思坎人与希腊人及环地中海地区其他民族的贸易的发达，维拉诺凡时期的文化进入了一个所谓“东方化”（Orientalizing）的时期。此时的伊特如思坎文明结晶于它的都市中心（坐落于当今波伦亚市），在仪式和日常用品中，斯芬克斯、神话动物、复杂的花纹占据了重要地位，丧葬文物更集中表现了来自海外的意识形态和风格的影响。

公元前六世纪，维拉诺凡时期为塞多萨时期所取代。这个时期，波河谷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的重大变迁，包括波伦亚在内的三大都市中心建立起来，在伊特如思坎、希腊和跨阿尔卑斯的欧洲（当时称为“费尔西那” [Felsina]）之间，一个紧密的文化交流网络最终生成。在这一时期，文字的使用成为平常的事情，来自希腊、跨阿尔卑斯的欧洲等地的象征纹样，在本地的仪式和日常用品装饰中扮演了极为突出的角色。公元前四世纪，高尔人（Gauls）入侵波伦亚，在考古学文化上，我们看到了



“东方化”的见证

大量铁制武器的引进。到公元前189年，罗马帝国在此地建立了殖民地，从此使“伊特如思坎文明”最终消失，进入了一个以帝国殖民文化，而非以当地为中心的文化交流网络的文化类型。

为了表现“伊特如思坎文明”的辉煌，市民博物馆从2000年10月1日开始组织了一项特别展示项目，它以“伊特如思坎公子——在地中海和欧陆之间”为题，再现了“伊特如思坎文明”的文化交流景象。我有幸在这期间访问波伦亚，否则早已失去了解意大利古史真面目的机会。这个特别展示项目，展现的是公元前八到六世纪之间“伊特如思坎公子”的生

活，它通过再现密集的文化交流时期“伊特如思坎公子”的一生，来展示当时的人们受到的各种文化的影响。在公元前八到六世纪之间，意大利北部地区的贵族家庭形成一种特殊的联合关系，他们以互相之间的热情好客为特征，所用的礼俗深受来自近、中东地区的文化的影响。这样一种独特的贵族生活方式，即考古学家称为“东方化的文化潮流”，表现为贵族家庭在海外——如巴勒斯坦、叙利亚、塞浦路斯等地——寻求表现自身突出社会地位的象征物品和风格。

展览的入口处，被塑造成船形，表现文化交流和贸易。展览的第一部分集中表现“东方化”的代表性文物、观念和风格。它包括一整套奢侈品，这些奢侈品是历史上不同地区之间贸易的主要物品，同时也是表达特定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风格的空间流动的载体。展品中，大型的青铜釜和酒杯，显示了贵族家庭之间宴会时的烹调和饮食习惯。在丧葬习俗中，生活于“伊特如思坎文明”中的贵族使用了来自塞浦路斯的火葬制度，因而展品中也突出了精美的红色陶制骨灰盒。此外，展览还强调了“伊特如思坎文明”后期希腊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希腊时期将“东



方化”时期的神秘动物雕塑摆设于公共空间的习惯。

展览的其他部分，分别展示了伊特如思坎公子的宫殿、墓葬、生活方式及他们的贵族妇女的面貌。展览给我们的印象是，伊特如思坎公子的宫殿综合了希腊工匠的建筑技术和中东地区宫殿建筑的内部空间设计技巧，在这种宫殿中，天花板装饰着公子祖先的雕像，这种祖先雕像弥漫着伊特如思坎地区的文化，在其乡村地区也能见到。在宫殿中举办的宴会（如婚礼宴会），招待着来自本地和海外的贵族家庭，也显示着贵族家庭能够超越本地与海外的同类形成关系的能力。伊特如思坎公子活着的时候生活在辉煌的宫殿之中，死以后同样讲究他们的“阴宅”的富贵。展览的“墓葬”部分从墓葬的建筑和陪葬器物来表现伊特如思坎公子在死后的社会地位象征。伊特如思坎公子的墓葬与他们的宫殿一样，装饰着大量的冠饰和盾牌，有些骨灰盒和棺材本身即塑造成这两种表现社会地位的形式。陪葬的物品中，表现着公子生前在宫殿中生活的场景——有忙碌的仆人、乐师及摆满食品的餐桌。从海外进口的酒类，到公元前七世纪以后成为伊特如思坎公子的地位的象征，因而在他们的墓葬中酒器和饮酒的人物造型也很突出。公子突出的社会地位，更表现在其对战争和狩猎的特殊兴趣上，而在墓葬的陪葬青铜器上，这两种图景和纹样



中世纪晚期意大利传教士想象中的孔子



威尼斯一角

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荷马史诗中，我们已经了解到那个时代公子的家妇与其他的妇女之间，在社会地位方面构成了十分明确的区分。对“伊特如思坎文明”的考古学研究，进一步使我们看到公子的宫殿和墓葬中妇女被分为公子的夫人和她们的的女仆，这样的区分表现在从事“女红”的夫人和做家务活的女仆之间的差异。此外，文字的使用，显然也是公子社会地位的一种特殊象征。在伊特如思坎公子的墓葬中，发现大量的书写用具和物体，使用字母是当时贵族的特

权，而这些字母也并非当地发明的，而可能来自中东和北非地区。

严谨的社会史专家读了以上这段描述会立刻注意到，以贵族公子的一生来呈现波伦亚古史的文化交流，让我们难以体会当时的一般人民是否与贵族阶层共享着以“他者”的文化为中心的自我社会地位象征的界定。诚然，我们不应否认，考古学发现的那些璀璨的古文化遗存，大抵属于“伊特如思坎文明”上层阶层心态的表露，它是贵族用品、生活和丧葬方式的铺陈，而与一般民众的生活关系不大。不过，我们却不应回避，倘若这样的“他者中心”的贵族文化心态成为波伦亚古代望族的“时尚”，那么，民间文化对于这种“时尚”的效仿，即恐怕是难以避免的潮流。（在一个文明社会当中考察“文化”，这一点是不可避免应当考虑的。）我倾向于认为，上层礼俗和下层社会的“风俗习惯”的互动关系，是造就一个特定文明类型的“文化总体特征”的基本途径。在波伦亚的历史上，尤其是在“大秦国”有它的声望之前，尊重所有“他者”（Other）的



文化心态已经存在,而正是这种“他者心态”——那种欣赏、包容、吸收别人的文化的心态——为西方文明在后世的世界性拓展提供了思想的可能性。

我能够相信,这样一种心态,在意大利的历史上并非是独一无二的。访问波伦亚之后,我去威尼斯观光,在那里进一步体会到了在比“伊特如思坎文明”晚近的另外一个时代中,意大利人的“他者中心”的文化心态的具体表现。威尼斯之名来自拉丁文“Venetia”,是罗马人用来指代整个波河流域的原始居民。早期来威尼斯居住的意大利人,主要是公元四五世纪被驱逐出意大利北部的人民,他们来这个小岛上居住,为的是躲避大陆统治者的奴役。在政治意义上,威尼斯成立于730年,它的成立与当时诸多岛屿地区独立于拜占庭帝国的运动有直接关系。这里的人民最热衷从事的是中间贸易,即作为交易两方的第三者面目出现,十四世纪以后成为其他贸易强国的对手,但威尼斯商人为了保护贸易者的独立性,反对来自意大利大陆及后期的海洋帝国西班牙的征服,在十五世纪时,当欧洲地区因天主教和新教纷争席卷各地之时,威尼斯却采取宗教文化宽容的策略,使不同教派的人到这里和平相处,并给予来自其他国家的避难者以安身立命之地。尽管拿破仑等曾于十八世纪强迫改变威尼斯的特殊文化氛围,时至今日,这里多元文化和平共处的状态,仍然在高度发达的旅游—贸易业中充分显示其魅力。

将不同于自身的文化当成自身文化构成的主要因素,或者更准确地说,承认“他者”在本文化中的价值意义,而非简单的“怀柔远人”或“文化宽容主义”,是“伊特如思坎文明”与后来的威尼斯历史的共同特征。如果说这样的精神对于波伦亚和威尼斯城市的兴起与繁荣分别有着最为直接的贡献的话,那么,罗马帝国对于波伦亚的占领史、拿破仑对于威尼斯的阴谋史,就应当说是扼杀了尚未衍生为跨文化交往成熟准则的文化形式的暴力史。我这样说,目的不是要发发“好古幽思”,而仅仅是想要表达一下我们从历史的逆向回溯中,可能获得的对于当代文化生存有益的启示。其实,尽管人们一直以上古、中古、近代三段式的篇章来叙述西方以至整个世界的时间进程,但历史学家们却从来没有否认文艺复兴到启蒙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上古文明的那种人本的开放心态的回归。

从埃柯本人的大量学术论著中,我们更看到了一种可取的趋向:启



蒙运动追求“完美科学语言”的行动，矛盾地表现为西方哲学家对于中东、埃及、印度和中国古文明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的介绍和修改；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因而可以认为西方近现代知识体系的创设，大大地依赖于西方文化对于其他文明体系的因素的吸收（虽然在吸收过程中，很多方面是被误解了的），而这种吸收的模式，可以追溯到在“伊特如思坎文明”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的上古“他者中心”的文化论。威尼斯式的互惠交换及“和而不同”的宗教并存模式，可以说是意大利民间对于这种文化论的进一步阐发。

我后来接受了 Alexandro 的邀约，准备找一个机会去他那个充满热情的意大利南方故乡走一走。但我想说，个人在波伦亚短短几天内所见到的意大利北方历史文化的面貌，已经给了我不少跨文化旅行的教益，在地中海古代文明的考古研究中获得的那些新的见解，更为这一未来的访友之行搭起了一座意识上的桥梁。我不否认，在没有更完整的历史和考古依据的情况下，我们尚不能定论“伊特如思坎文明”的族群所属（还有学者认为伊特如思坎人是欧洲大陆人种），而与此同时，通过考古资料呈现出来的这一新的图景或许会因为它的资料局限和面临的种种误读而陷落入一个同样危险的认识论境地之中。可是，对意大利北部古史的这一点观察，却已经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值得延伸的文化互动形式。这种互动形式的历史性为我们指出，在漫长的近现代史过程中，我们思想界的先辈对于西方“大秦国霸道”的那些想象，对于这种霸道式微的那些惋惜，等等，恐怕有待我们今天的学者来重新思考——这种重新思考对于我们未来跨文化活动，有着深远的思想和现实意义。

（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